

# 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发展历程、特点及价值

——以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北京(北平)年鉴(年刊)为例

高潇潇 陈明 刘岳\*

**摘要**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成风,缘起于西方的统计年鉴传入中国,并为政府部门、学界、实业界所接受,中国年鉴进入初创探索时期。之后,中国年鉴进入相对快速发展时期,部分政府部门、民营出版机构、学校、研究机构等纷纷创编年鉴,中国年鉴发展一度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直到1949年,艰苦动荡的时局遏制中国年鉴发展势头,中国年鉴发展进入低谷期。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顺应时风,创编数十种年鉴(年刊),在中国年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以国家图书馆藏的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发展历程,从出版主体、经费来源、体例编排、内容特色四个维度提炼出民国时期北京年鉴的特点,从沿革研究、量化研究、法规研究、行业研究角度剖析其价值。力求为民国时期中国年鉴的搜集研究、创新转化提供先行探索,也为现今年鉴在资料收集、保存、开发利用上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北京年鉴 发展历程 年鉴价值

年鉴旧称年刊、年报,是概述或汇集截至出版年份为止的上年度时事文献、统计资料或学科最新进展,按年度逐年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sup>①</sup>民国时期,由政府部门主持编纂的资料性工具书多称“公报”<sup>②</sup>;由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专业团体按年编纂出版的行业发展

---

\* 高潇潇,男,山西省石楼县人,北京市方志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年鉴史、年鉴学;陈明,男,北京市人,北京市方志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历史地理学;刘岳,男,北京市人,原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北京党史、方志学。

①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② “公报”最初出现于清朝末期,译自西文的 gazette 和 bulletin,其意思是“公开布告”,最初有传教士、知识分子、民间团体等非官方人士或机构创办的《万国公报》《国民公报》《社会公报》等,明显区别于清廷或地方政府主办的《政治官报》《金陵官报》《粤东官报》等报刊。民国初期,为了弘扬民主精神,“官报”改名为“公报”,逐渐成为政府机关报,如《临时政府公报》。

报告多称“年报”<sup>①</sup>；由学校推出的年度性资料汇编通常名为“年刊”<sup>②</sup>。无论是公报、年报还是年刊，均集数据、文献、情报、资料为一体，是特定区域、领域（行业）、时限内多元化信息载体，应纳入年鉴范畴。<sup>③</sup>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有关民国时期的年鉴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王世伟最早剖析中国早期年鉴发展背景动因及编纂情况；王燕亭、刘崇民立足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年鉴，梳理中国早期年鉴发展的基本情况；徐佳佳从学科角度探析民国统计学兴起对年鉴事业的影响以及民国时期“年鉴热”兴起的原因等；方书生从年鉴价值属性探讨近代中国年鉴特点；徐鹏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年鉴编纂出版概略。<sup>④</sup> 截至目前，有关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年鉴（年刊）研究仍是空白，笔者拟以国家图书馆馆藏北京（北平）年鉴（年刊）为研究对象，对此描绘其历程、提炼其特点、分析其价值。

## 一、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发展历程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库明代佚名撰、清咸丰元年（1851）成书的《明四代年鉴》（1函4册，抄本）是目前已知中国较早冠以“年鉴”的书籍。<sup>⑤</sup> 该书收录明朝12位皇帝理政199年的“大事、要事”，其编纂体例与今日年鉴中的“大事记”相仿。只是，该书编纂仍依循传统史志体例，可谓简缩版《明实录》，不能纳入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范畴。

### （一）西风东渐，本土年鉴创始起步（1840—1926）

19世纪中叶，中国国门渐开，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年鉴作为一种西方工具书也随之进入。经过新教传教士引进、晚清官办翻译机构和民办报刊编译，在北洋政府承续清末旧制颁布实施一系列涉及年鉴编纂的法令之后，年鉴正式进入创始阶段。<sup>⑥</sup> 几乎同时，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进入中国，并被应用到政府部门、学术研究和出版经营等领域，成为一门快速本土化且产生较大影响的学科。<sup>⑦</sup> 统计学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本土年鉴编纂提供方法和资料来源，还为其发展提供机构保障和早期年鉴人才，助推了年鉴创始发展。<sup>⑧</sup> 清末民初，以卢靖为首的中国早期学者认为统计年鉴具有“合世界万有之现象，条理而贯

①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② 吴志铎：《〈潞河年刊〉序》，《潞河年刊（1929—1930）》，潞河年刊社，1930年，第3页。

③ 牟国义：《承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

④ 王世伟：《中国早期年鉴编纂出版述略》，《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2期；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徐佳佳：《学科建设视角下民国统计对年鉴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21年第3期；方书生：《近代中国年鉴的特征与启示》，《上海地方志》2017年第4期；徐鹏：《民国时期浙江年鉴编纂出版概略》，《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7期。

⑤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⑥ 牟国义：《承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

⑦ 徐佳佳：《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影响下的年鉴事业》，《新疆地方志》2021年第2期。

⑧ 徐佳佳：《学科建设视角下民国统计对年鉴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21年第3期。

串之,放之则缩为一册,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sup>①</sup>功能,先后引进以《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等为代表的西方统计年鉴,为中国年鉴事业开山奠基。

清同治三年(1864),英国人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后,创编二卷本《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包括货物报告、货物类编、国内贸易统计等内容,之后连续出版,直到1948年止,<sup>②</sup>当属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辛亥革命以后,年鉴编纂被当作“推进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sup>③</sup>,备受重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年鉴编纂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发展实际,陆续编纂出版《中国外交年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银行年鉴》等20余种年鉴。<sup>④</sup>其中,《各国陆军年鉴》《财商年鉴》等成书于北京。中国年鉴事业进入创始发展时期。

## (二)“年鉴热”勃兴,本土年鉴快速增长(1927—1936)

这一时期,中国年鉴进入相对快速发展阶段,本土年鉴品种、数量增长较快,一度出现“年鉴热”。据肖东发等主编的《年鉴学》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1937年之前),中国正式出版年鉴(不包括年报、年刊)攀升至53种,其中民营出版27种、官方出版26种。<sup>⑤</sup>另据国家图书馆馆藏部统计,1927年至1936年,中国在版年鉴175种。<sup>⑥</sup>其中与北平关联的年鉴5种、7卷。其中2种、2卷专记北平事物,3种、5卷属在北平地区出版,但有关北平的记述很少。

在“年鉴热”的影响下,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众多学校纷纷编印年鉴(年刊),以“记载以往一年中办学的成绩,以作为来年志鉴,取长补短,努力教育事业”<sup>⑦</sup>。据国家图书馆馆藏部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7年,全国出版的年刊约有184种,其中有据可查的学校年刊(含学校年鉴)大约77种。<sup>⑧</sup>和北平关联的学校年鉴有2种、11卷,冠名学校年刊的有17种、47卷。其中8种、21卷属北平地区大学及专科学校年刊,8种、25卷属北平地区中学年刊,内含3种、7卷女子中学年刊,此外还有1种、1卷,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搬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在京校友会年刊》。

## (三)战火绵延,遭遇“劫难”萎缩严重(1937—1949)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让刚刚步入稳定发展、探索升级之际的中

① [日]伊藤佑毅编纂、谢荫昌译:《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方书生:《中外交融下近代中国年鉴的生成与演化(1846—1849)》,《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② 张耀华:《〈海关中外贸易年刊〉的出版始末》,2013年,http://www.yearbook.cn/?p=19&a=view&r=404[2013年10月30日]。

③ 李维民:《中国年鉴史料》,徐佳佳:《学科建设视角下民国统计对年鉴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21年第3期。

④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⑤ 肖东发等:《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49~53页。

⑥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⑦ 潞河年刊编辑委员会:《潞河年刊(1929—1930)》,潞河年刊社,1930年,第3页。

⑧ 依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学校年鉴(年刊)统计分析结果。

国年鉴(年刊)事业折入发展艰难期。许多年鉴被迫停刊,据国家图书馆馆藏部统计,1937年至1945年,全国大约有130余种年鉴停刊,仅见48种年鉴继续出版。北平沦陷后,5种与北平关联的年鉴也被迫停刊。日伪北京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新创《华北宗教年鉴》和《市政统计年鉴》2种年鉴。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部分学校西迁内地办学,个别学校年鉴(年刊)继续出版。部分留守学校虽依旧出版年鉴(年刊),但迫于日伪政府压力,被迫调整办刊宗旨,服务于日伪反动统治。北平年鉴(年刊)发展进入艰难时期。当时,北平的24种学校年鉴(年刊)中,16种或停刊、或西迁内地,只有《北农年刊》《辅仁大学年刊》《北平平民中学年刊》等8种学校年鉴(年刊)继续出版。

抗战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中国时局依然艰难。据国家图书馆馆藏部统计,1946年至1949年,全国仅有43种年鉴在版,日伪时期全国停刊的130余种年鉴,复刊者寥寥,北平未见有年鉴复刊,学校年鉴(年刊)亦然。抗战胜利后部分学校返迁后,恢复办学,但是年鉴年刊复办者甚少。<sup>①</sup>北平仅见《中国大学年刊》《育英年刊》《北平平民中学年刊》为代表的3种、4卷年刊出版。

据国家图书馆馆藏部统计,民国时期(1912—1949)年鉴(包括年报、年刊)合计952种,其中年刊479种、年报280种、年鉴193种。<sup>②</sup>和北京(北平)关联的年鉴类书刊32种、80余卷(见表1)。

表1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出版年鉴(年刊)一览表

序号	名称(创刊年份)	出版年份
专记北京事物的年鉴		
1	北平光社年鉴(1927)	1927
2	商业新年鉴(1932)	1932
3	市政统计年鉴(1939)	1939
北京地区出版的其他年鉴		
4	各国陆军年鉴(1914)	1914
5	中国劳动年鉴(1928)	1928、1932
6	世界各国国势年鉴(1934)	1934
7	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年鉴(1930)	1930、1931
8	华北宗教年鉴(1941)	1941
北京地区的年刊(大学及专科)		
9	北工年刊(1943)	1944
10	北农年刊(1941)	1942

①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② 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

(续表)

序号	名称(创刊年份)	出版年份
11	协医年刊(1924)	1924
12	辅仁大学年刊(1939)	1939、1941、1942
13	中国大学年刊(早于1934)	1934、1941、1943、1948、1949
14	燕大年刊(1928)	1928—1929、1930、1931、1932、1940、1941
15	清华年刊(1921年创刊、1934年改版)	1928、1934、1935、1936、1937
16	北平铁路大学年刊(1932)	1932
17	京华美术学院年刊(1936)	1936
18	财商年鉴(财商学院年鉴)(1926)	1926、1927、1928、1930、1931、1932、1934
19	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年鉴(1932?待考)	1932、1933、1934、1936
20	财政商业专科学校、才正高级职业学校年刊(1936)	1936
21	第一助产学校年刊(1930)	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
北京地区的年刊(中学)		
22	潞河年刊(中学)(1928)	1928、1929—1930、1931、1935
23	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年刊(1937?待考)	1943
24	育英年刊(完全学校)(1929)	1932、1933、1934、1935、1938、1941、1947
25	翊教年刊(女中)(1931)	1931、1932、1936
26	贝满年刊(女中)(1931?待考)	1931、1935
27	北平平民中学年刊(1948)	1948
28	崇德年刊(高中)(1929)	1933
29	崇慈年刊(中学)(1936)	1936
30	华光年刊(女中)(1933)	1934、1935
31	汇文年刊(中学)(1926)	1927、1928、1931、1932、1933、1934、1935、1936
北京地区的其他年刊		
32	东北大学校友会年刊(1934)	1934

## 二、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的特点

### (一)从出版主体上看,官办受限、校办“井喷”

民国初期,面对社会动荡、百业待兴的落后局面,为摸清家底、厘清国情,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主导统计年鉴编纂制度的构建,并由内务部、陆军部等拨付专款做大量统计调查。但受时局影响,机构变动频繁,最终仅短暂推出6种官办年鉴。<sup>①</sup>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部收藏的民国初期官办年鉴,仅见陆军部印行的《各国陆军年鉴》。

<sup>①</sup> 牟国义:《承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

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南迁,北京降格为北平特别市,但依然是中国文化教育中心。自1898年清政府批准设立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北平有教育部承认的专科以上高校23所,其中国立大学及学院5所、私立(个人、教会、外国人办)大学及学院10所、专科学校8所;<sup>①</sup>有市(公)立小学58所、私立小学184所、教会小学31所,市(公)立中学7所、私立中学56所、教会中学16所。<sup>②</sup>恰逢“年鉴热”风靡北平,各级学校组织出版的年鉴(年刊)迎来“井喷”式发展。正如《〈潞河年刊(1929—1930)〉前言》所载:“近来北平各大学十之八九全要每年刊发一册年刊;中学也继续仿效的不少,甚而小学出年刊的也有。”<sup>③</sup>根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23所北平的学校年刊卷本推断,《中国大学年刊》《清华年刊》《燕大年刊》《第一助产学校年刊》等5所大学专科学校年刊至少连续出版4年;<sup>④</sup>《潞河年刊》《育英年刊》《汇文年刊》等3所中学学校年刊连续出版5年以上,另外《协医年刊》《北平铁路大学年刊》等4所大学专科学校年刊,以及《北平平民中学年刊》《崇慈年刊》2所中学学校年刊无法确证是否连续出版。

## (二)从经费来源上看,官费有限、民办自筹

1928年以后,北平、上海、南京等较为发达城市涌现一批由出版机构参编的非官办、民营年鉴(年刊),推动年鉴的勃兴。<sup>⑤</sup>据《中国年鉴史料》载,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年鉴(年刊)有数百种,八成为民营机构出版。<sup>⑥</sup>国家图书馆藏23种<sup>⑦</sup>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学校年鉴(年刊)全部是民营出版,各学校自主编纂、自筹经费,未见政府部门资助。这些年鉴(年刊)普遍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其中,《第一助产学校年刊》《北平铁路大学年刊》《翊教年刊》经费全部由校方划拨,有保障;《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年鉴》《育英年刊》《华光年刊》等6种年鉴(年刊)经费以校方拨付为主、广告收入为辅,经费筹措相对容易;《协医年刊》《辅仁大学年刊》《清华年刊》《崇慈年刊》《北平平民中学年刊》等9种年鉴(年刊)经费主要靠广告收入、师生捐款、毕业生预购款,校方补贴非常少,经费筹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经费缺口;《北工年刊》《中大年刊》《京华美术学院年刊》《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年刊》4种年鉴(年刊)经费全靠自筹,校方只给予道义支持,风险非常大,容易因经费筹措不足出现停刊情况。比如,《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年刊(1937)》全部预算仅6000元,其中来自毕业生预付款不足3000元,广告费收入3000元,剩余部分由学生文艺团体演出门票收入补齐,<sup>⑧</sup>足见其经费紧缺。有限的经费只能满足年鉴(年刊)编纂出版最低需求,却也不

①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教育卷·高等教育志》,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②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教育卷·基础教育志》,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41~144、212~216页。

③ 潞河年刊编辑委员会:《潞河年刊(1929—1930)》,潞河年刊社,1930年,第3页。

④ 这一时期,其他大学和专科学校年刊是否连续出版,目前无法确证。

⑤ 徐佳佳:《20世纪30年代民营出版业“年鉴热”原因及影响分析》,《广西地方志》2021年第4期。

⑥ 李维民:《中国年鉴史料》,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2003年,第157页。

⑦ 此处23种学校年刊未包含《东北大学校友会年刊》。

⑧ 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学生会:《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年刊》,1937年卷后记,1938年。

妨碍这些学校年鉴(年刊)义务编纂人员秉承节俭办刊原则,只为传承发展年鉴(年刊)事业。

此外,这些年鉴(年刊)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编纂队伍不稳定的挑战。23种学校年鉴(年刊)均组建专门年鉴编纂机构——年鉴(刊)社或年鉴(刊)委员会,承担年鉴(年刊)编纂任务。《协医年刊》《汇文年刊》《华光年刊》《潞河年刊》等13种年鉴(年刊)由校方和学生共同组成编委会,以校方人员为主体,编纂队伍比较稳定;《北工年刊》《北农年刊》《中国大学年刊》《财商学院年鉴》《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年刊》等10种年鉴(年刊)完全由学生自主负责编纂,人员变动频繁,编纂队伍非常不稳定,容易导致学校年鉴(年刊)的停刊断档。

### (三)从体例编排上看,引入统计、广用图表

中国早期年鉴是“在西方年鉴的影响、中国统计事业的勃兴和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sup>①</sup>。中国人自编的年鉴,除《北平光华年鉴》一种摄影类年鉴外,也多引入统计思维,分门别类“集结相关领域的统计数据资料,以供按索”<sup>②</sup>。当时,广用统计图表几乎成为民国年鉴(年刊)的主流和“标配”。

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地区出版的8种年鉴中,有5种采用统计方法,刊录统计资料。《市政统计年鉴》作为一种专业的统计年鉴,自然以统计图表为主,详实刊录日伪时期北平户籍人口、商业等方面的大量调查数据。《中国劳动年鉴》则专设统计图表,详记北平人口、劳工数量、工资收入、生活指数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年鉴》则以扇形图、线条图、柱状图及统计表的体例,载录辖区内北平地区工商业税收分布、收入类型等详细资料。《华北宗教年鉴》也专设统计图表专栏,详刊华北各地区及伪北京特别市宗教信仰徒统计资料。即便是国别性年鉴——《世界各国国势年鉴》,在记述中国面积、人口、政治、财经产业、贸易、交通及边疆情况时,也没有遗漏与北京相关的数据。

国家图书馆藏23种、74卷民国北京(北平)学校年鉴(年刊)中,除《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年刊》外,都无一例外地设置统计图表,刊录学校年度毕业生相关信息资料。其中,《潞河年刊》《第一助产学校年刊》等5种年刊尤为重视统计数据收集,均设置统计专栏,详尽收录毕业生人数、所属班级、性别、籍贯、家长职业、学生疾病、经费收支、教职员统计等重要数据,篇幅约占1/4多。可见,使用统计图表确已成为民国北京(北平)年鉴(年刊)内容设置的一种形式。<sup>③</sup>

### (四)从内容特色上看,官刊广收资料、民刊多发照片

民国时期,“官办”年鉴(年刊)强调“年鉴资料获得最善与最广之利用”<sup>④</sup>,故专注于资料的收集,对照片入鉴鲜有关注。这一点在《各国陆军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世界各

① 李维民:《中国年鉴史料》,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2003年,第157页。

② 方书生:《近代中国年鉴的特征与启示》,《上海地方志》2017年第4期。

③ 徐佳佳:《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影响下的年鉴事业》,《新疆地方志》2021年第2期。

④ 董显光:《〈中华年鉴(1948)〉卷序》,中华年鉴社,1949年。

《国势年鉴》《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年鉴》《华北宗教年鉴》《市政统计年鉴》6种“官办”年鉴中均有体现。《各国陆军年鉴》主要收录世界多国的国势、兵役制、军制、要塞等文字资料,无图片。《中国劳动年鉴》刊录全国劳工人口(工资、物价、生活费用、工作时间、年龄知识程度、失业)状况、农民状况、手艺人、车夫状况等翔实资料,无图片。其他4种年鉴亦然。而商业日报社主办的非官方的《商业新年鉴》除刊载商业信息外,还专文收录有关北平政界官员、军队长官、商界领袖等情况,并附照片予以说明。

1922年,北京部分摄影爱好者创设民间摄影艺术协会——“北京光社”,并于5年后创办摄影艺术年鉴——《北平光社年鉴(1927)》。<sup>①</sup>该年鉴由光社会员、北大教授刘半农作序,并精选16位摄影艺术家拍摄的48幅自然景象、社会风情、人物特写等作品予以刊载,备受摄影爱好者的关注。

国家图书馆藏23种北京(北平)学校年鉴(年刊),均刊载摄影图片,大致包括三类:一是人物图片,主要包括学校董事会、领导机构成员、教师、毕业班学生等。二是校景图片,一般包括校门、校舍、校室、图书馆、餐厅、操场等。三是活动场景图片,主要包括体育比赛活动、学科实验及学生实习场景等。这些学校年鉴(年刊)中,除《北工年刊》《第一助产学校年刊》《崇德年刊》摄影图片占比相对较低,其余20种年鉴(年刊)摄影图片占比均超过50%,其中《潞河年刊》摄影图片占比高达84.9%。11种大学及专科学校年鉴(年刊)摄影图片平均占比64.0%,而中学年鉴(年刊)摄影图片平均占比75.9%,显然高于大学及专科学校年鉴(年刊)。这与大学及专科学校年鉴(年刊)和中学年鉴(年刊)办刊主旨相异有一定关系。大学及专科年鉴(年刊)以记录学生过往、宣示学校的情况、传播学校精神为主旨。而中学年鉴(年刊)以宣传学校、扩大生源,尤其私立中学校年刊更是以提升学校知名度、招揽生源为主旨。如《〈潞河年刊(1929-1930)〉序文》阐明:“凡接到这一本年刊的不是潞河的同学,就是潞河的朋友,凡阅读这一本年刊的不是我们的同学的同学,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朋友。”<sup>②</sup>

### 三、民国北京年鉴(年刊)的价值

当前,民国时期年鉴(年刊)多已湮没史海,难以查寻。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与北京有关的民国年鉴(年刊)仅有32种、80余卷。这些年鉴(年刊)刊载民国时期北京(北平)的一些珍贵的史料,亟待需要挖掘、开发利用。

#### (一) 发展轨迹记录清晰,为沿革研究提供资料

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年鉴(年刊)篇首多设小序、小记、校(院)史、沿革等,详尽介绍主办机构的创设与沿革以及院校的创立和发展史。如《北平光社年鉴(1927)》的“序”就详述北京光社的成立、发展、运营情况及年鉴编纂情况等;作为《商业日报》20周年特刊,

<sup>①</sup> 刘复:《北平光社年鉴(1927)》,北京光社,1928年1月。

<sup>②</sup> 潞河年刊编辑委员会:《潞河年刊(1929—1930)》,潞河年刊社,1930年,第3页。



《商业新年鉴(1932)》收录《商业日报》20年发展史、中国时局发展史、北平商会沿革发展、北平银行发展概况等资料;《中国大学年刊(1949)》简要记述自孙中山创办起,初为国民大学、后为中国公学、终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东北大学校友会年刊(1934)》简略记述自1922年在沈阳创立后,“九·一八”事变后迁入北平的坎坷发展史;《华北宗教年鉴(1941)》系统记述佛教、喇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日本宗教及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略史,民国以来的宗教大事记,各宗教寺、会、堂华北省市发展分布情况及教徒发展情况以及教义教规实施情况等。

## (二) 统计数据载录丰富,为定量研究提供资料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年鉴(年刊)卷号尽管缺失较多,但其中载录的统计数据仍可为研究民国时期北京(北平)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教育史、年鉴发展史提供重要的资料支持。《中国劳动年鉴(1932)》作为专刊中国劳工发展状况的专业年鉴,收录1932年北平劳动力人口、失业人口、北平生活指数等重要数据资料。《市政统计年鉴(1939)》详实记述1939年北平辖域的户籍人口、工业、商业、警察、财政、教育、建设、观光、救济等11个方面的统计资料,分类记述,编印成帙。《翊教年刊(1936)》借助示意图、饼状图、线条图、柱状图,展示学生籍贯分布情况、家长职业分类、历年注册学生人数比较、全校教职员工人数统计、学生人数、学生年龄分布情况等。《潞河年刊(1931)》使用统计表、柱状图、线条图等体例,全面展现潞河中学(1926—1930)学校收入、学生缴费、学校支出等重要对照数据。《北平铁路大学年刊(1932)》利用统计图表,详实记述学生人数、籍贯、年龄、不同年级学生占比,教职工年龄、籍贯、资格等统计事项。《中国大学年刊(1949)》使用对比图、分布图、人数表,着重统计中国大学1949年各系毕业生人数、专业、工作去向等。《第一助产学校年刊(1930)》全方位记述该校运营情况、各种报表、手册、规章等。

## (三) 辑录规章制度资料,为法规研究提供资料

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颁行大量法律、法规、规章,一些相关法律文献被民国年鉴(年刊)收录。比如《华北宗教年鉴(1941)》汇编《寺庙关系法规》《学校关系法规》《古物古籍关系法规》《文化团体关系法规》《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关系法规》《慈善事业关系法规》《红十字会法规》等中华民国相关的宗教法规。陶孟和主持编纂的《中国劳动年鉴(1928)》汇编民国时期相关劳动法令,如《工厂法》《特殊劳动法》《佃农保护法》《劳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年鉴(1931)》专设“法规章程”分目,收集《修正财政特派员暂行章程》《河北麦粉通税条例暂时实施细则》等43种股权法律章程及细则。《第一助产学校年刊(1930)》刊载《产妇婴儿卫生计划大纲(1929—1934)》《助产教育计划大纲(1929—1934)》等。

## (四) 实用信息视角独特,为行业研究提供资料

民国年鉴(年刊)还收录一些实用资料和广告信息。《各国陆军年鉴(1914)》专载各国军官薪俸表;《市政统计年鉴(1939)》收录《北京特别市公署及所属各机关职务简明表》;《商业新年鉴(1932)》刊载《民国廿一年六十甲子男女九宫度生属表》《中华民国廿一

年岁次壬申时宪通书》;《财商年鉴(1931)》设置北京财商学院会计科名词中英文对照表;《清华年刊(1936)》增刊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参观使馆、社会游行、争取和平自由等事件的资料。多数年鉴(年刊)设置与出版单位相关或行业关联的广告专栏,如《世界各国国势年鉴(1934)》由外交月报社发行,专行刊录外交月刊社出版的各种刊物、图书订购信息。《商业新年鉴(1932)》刊载银钱局、银行储蓄广告;《协医年刊(1924)》刊发有关医疗器械、诊所、医院、药品等广告;《潞河年刊(1928)》刊发有关学习用品、服装店、食品店等广告;《北平光社年鉴(1927)》刊发有关摄影器材、照相馆等广告。

概而言之,民国北京(北平)年鉴(年刊)“记所不能尽者,通之以表,表所不能穷者,显之以图”<sup>①</sup>,留存第一手文字、数据和图片资料,对民国北京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 四、结 语

20世纪初,民国初立,民风初开,年鉴作为实用工具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发芽。作为时代的产物,民国年鉴的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中华民国短暂的勃兴,促成年鉴“百花齐放”;日寇入侵、内战频仍,造就年鉴“百花凋谢”。作为历史的载体,民国年鉴不仅记载了充满历史智慧的中国文化,而且记录了反映中华民族屈辱的坎坷发展史。遗憾的是,绝大部分民国年鉴早已湮没史海,真正存世的民国年鉴数量极少。笔者研读了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珍贵底本,通过甄别、整理、分析珍贵史料发现,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官办受限、校办“井喷”,官费有限、民办自筹,体例编排上广用图表,官刊广收资料、民刊多发照片。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具有重要价值,可为沿革研究、定量研究、法规研究、行业研究等提供丰富的资料,对民国北京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时代,正阔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年鉴事业蓬勃发展,正在由年鉴大国向年鉴强国迈进。历史是连续的,我们研究民国年鉴,可以从中汲取人文智慧,也可以从中总结年鉴工作的经验、教训,广大年鉴工作者应在年鉴工作实践中予以借鉴,把绘就伟大的时代演进、记录关键的发展瞬间作为新时代的记录者的崇高使命,不断推动年鉴事业发展跃上新台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历史智慧和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李一龙

<sup>①</sup> 牟国义:《承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